



海上丝绸之路 环境、人文传统与贸易网络



姜波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古代风帆贸易的海上交通线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探究海上丝绸之路港口、沉船和贸易品等文化遗产,展示了东、西方文明的海洋对话。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风帆贸易;文明交流

Abstract: The maritime silk road have been the ancient navigation line of sailing trade, relying greatly on the oceanic advantage as the monsoon and sea currents. The maritime silk road promoted not only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exchange, but also religious and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s of the ancient seaport, shipwreck and trade artifacts reveal the prosperous history of maritime dialogu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Key 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Sailing Navigation Trade; Civilization Contact

一、海上丝绸之路是风帆贸易的海上交通线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简言之,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古代风帆贸易的海上交通线路。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族群主要有:古代中国人、波斯-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以及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西方殖民贸易者。以古代中国为视角,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成熟于隋唐五代,兴盛于宋元明时期,衰落于清代中晚期。海上丝绸之路既包括国家管控的官方贸易,也涵盖民间自发的贸易形态。官方贸易以郑和下西洋(1405年-1433年)为巅峰,民间贸易则以明代“隆庆开海”(1567年)为标志,曾一度达到极度繁荣的状态。

海上丝绸之路反映了古代不同文明板块之间及其内部的文化交流。从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贸易圈,如东北亚贸易圈、环南海贸易圈、孟加拉湾贸易圈、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东非贸易圈和地中海贸易圈,由此而对应形成了古代东亚儒家文明圈、印度文明圈、波斯-阿拉伯文明圈和地中海文明圈。

由不同族群主导的海上贸易活动形成了各自的贸易线路与网络,古代中国人的海上贸易线路,以郑和航海时代为例,其主要的海上航线为:南京-泉州-越南占城-印尼巨港-斯里兰卡“锡兰山”(加勒港)-印度古里(卡利卡特)-波斯湾忽鲁谟斯(霍尔木兹)。这条航线将环南海贸易圈、印度-斯里兰卡贸易圈和波斯-阿拉伯贸易圈连贯成一条国际性的海上贸易网络,并进而延展至东非和地中海世界。进入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殖民贸易者建立了有别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贸易航线,如葡萄牙人的贸易线路为: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西班牙人的贸易线路为菲律宾马尼拉港-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秘鲁。澳门-马尼拉则是对接葡萄牙人贸易网络与西班牙人贸易网络的航线。

港口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遗存。中国境内的主要海港遗址有广州港、泉州港、福州港、漳州港、宁波港、南京港、扬州港、合浦港、登州港等。海外的港口,主要有越南的占城、印度尼西亚的巨港(旧港)、马来西亚的满刺加(马六甲)、斯里兰卡的加勒港、印度的古里(卡利卡特)、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霍尔木兹)等。西方殖民贸易时期形成的港口则主要有: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果阿、马六

*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重点项目“中华思想通史·原始社会卷”经费支持。

甲、巴达维亚、马尼拉、澳门、长崎等。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形成了诸如广州、泉州、马六甲、古里等著名国际海洋贸易集散港口，同时还形成了诸如斯里兰卡、琉球、马尔代夫这样的贸易枢纽。而在古代中国，由于面向东南亚和东北亚海外贸易的发展，分别形成了广东上下川岛和浙江舟山群岛两个“放洋之地”（意即“远航出海之地”）。

二、季风与洋流：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因素

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交通文明的智慧结晶，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初期的海上航行，最主要的方式是贴岸航行和跨岛航行。前者不言自明，即沿海岸线航行；后者则是沿岛链航行，如：自登州港起航跨岛群岛抵达辽东半岛的航行活动；自琉球经奄美群岛等向北直抵九州岛的航行活动；印度尼西亚群岛海域的跨海航行活动；自印度东北部起航经安达曼群岛抵达苏门答腊岛的航行活动，等等。这种航海活动，多以地文坐标作为导航标志，多系短途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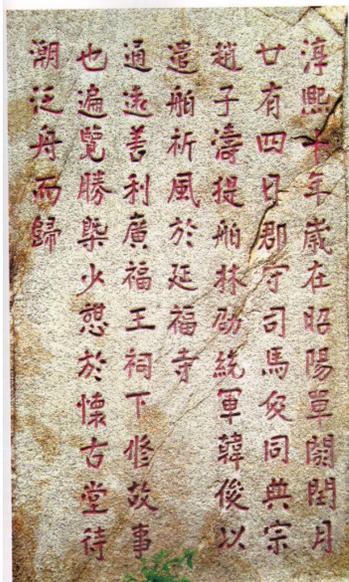
真正形成远洋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利用季风与洋流开展的航海活动。

无论是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还是地中海世界，人们很早就约而同地发现了季风的规律。以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为例，每年的冬季，盛行东北季风，风向从中国东南沿海吹向东南亚；每年的夏季，盛行西南季风，风向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半岛一带刮向中国东南沿海。正因南海海域的季风存在这样明确而守时的规律，古代中国航海家称之为“信风”。居住“季风吹拂下的土地”上的人们，天才地利用季风规律，开展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海洋贸易，冬去夏回，年复一年。

作为联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正好位于季风贸易的十字路口，古代船队到达这里的港口以后，需要停泊一段时间，等候风向转换，再继续航行，由此形成了印尼的巨港和马来西亚的满刺加两大海港。中国雷州半岛的徐闻、印度西南岸的古里，因为也是季风转换的节点，所以很早就成为海洋贸易的港口。

风帆贸易的传统，使得“祈风”成为一种重要的海洋祭祀活动。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便是这种祭祀传统留下的珍贵遗产（图一）。祈风石刻位于福建省南安县晋江北岸的九日山上，现存北宋至清代摩崖石刻 75 方，其中航海祈风石刻 13 方，记载自北宋

崇宁三年（1104 年）至南宋咸淳二年（1266 年）泉州市舶司及郡守等地方官员祈风的史实，堪称研究宋代泉州港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史迹。



图一 泉州九日山祈风石刻（姜波摄）

洋流也是影响海上航行的重要因素。例如太平洋西岸的黑潮，是流速、流量都十分强劲的洋流，对古代福建、台湾海域的航行有重要影响。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1565 年-1815 年），正是因为西班牙人发现了北太平洋洋流规律（即北赤道暖流-黑潮-北太平洋暖流-加利福尼亚寒流的洋流圈），才得以实现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之间的航行。

自然因素影响下的风帆贸易，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特征。首先，由于季风的转向与反复，使得双向交流互动成为可能；其次，季风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使海洋贸易也具备了周期性的特征，如从中国东南沿海去东南亚，冬去夏归，一年一个周期；如从中国去往印度洋，则需在马六甲等候风向转换，再加一个年度周期完成在印度洋海域的航行，故郑和前往波斯湾等西洋地区，至少要以两年为一个贸易周期。最后，由于季风与洋流的影响，使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港口转口贸易的明显特征，即中国航海文献所称“梯航万国”，像阶梯一样一站一站地实现货物的转运，同时也使海洋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广度。

三、文明板块与航海传统： 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因素

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板块之间交流的海上通道。由于自然资源与人文传统的不同，基于各自的地理单元，旧大陆形成了不同体系的文明板块，各板

块的资源、产品、科技、宗教与思想存在自身的独特性,使交易与交流成为可能。

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板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铜钱等;东南亚板块则有名贵木材、香料等;印度-斯里兰卡板块则有宝石、棉布等;波斯-阿拉伯板块则有香料、宝石、玻璃器、伊斯兰陶器等;地中海板块有金银器、玻璃等;东非板块则有象牙、犀牛角等(殖民贸易时代甚至“黑奴”也成为贸易品)。大航海时代以后,美洲的白银、欧洲的羊毛制品等也成为重要的贸易货物。

从考古实证来看,海上丝绸之路已经使古代世界形成国际性的贸易网络,我们不妨以中国龙泉窑的一种产品——龙泉窑荷叶盖罐为例,来解读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所谓的“陶瓷之路”(图二)。在龙泉窑大窑枫洞窑址上发现了荷叶盖罐的残件,确证这种产品的主要烧造地点就在浙江龙泉窑;在宁波港“下番滩”码头和泉州港宋代沉船上均发现了荷叶盖罐,结合文献记载,证明宁波港、泉州港是此类瓷器集散和装运出海的港口所在;韩国新安沉船是元“至治三年”(1322年)宁波港始发的一条商船,船上发现的荷叶盖罐可以看作是此类陶瓷产品装运出海的考古实证。翻检海上丝绸之路各沿线港口遗址考古材料,可以看到荷叶盖罐在东南亚、日本、琉球、印尼、波斯湾、东非、土耳其等地均有发现,“窥一斑而知全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外销瓷从窑址到港口到海外终端市场的贸易网络。



图二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龙泉窑荷叶盖罐
(引自《大元帆影》)

再如古代从海外输入中国的宝石,源出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却在中国明代墓葬中大量发现,尤以北京发掘的明定陵(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孝端、孝靖皇后合葬墓,下葬年代1620年)和湖北钟祥发掘的明梁庄王墓(梁庄王朱瞻垵与夫人魏氏的合葬墓,下葬年代1451年)为著。明墓发现的宝石,品种主要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祖母绿等(世界五大品类的宝

石惟有钻石尚未发现,但文献记载有海外采购之举)。郑和航海文献,详细记述了郑和船队在海外采购宝石的史实,如巩珍《西洋番国志》载“(忽鲁谟斯)其处诸番宝物皆有。如红鸦鹑(红宝石)、刺石(玫瑰色宝石)、祖把碧(绿宝石)、祖母绿(绿宝石)、猫睛石、金刚钻、大颗珍珠……”,云云,特别是书中记述的宝石名字,还是按波斯语中的称呼来记载的。与梁庄王墓宝石一同出土的还有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西洋金锭”(图三),生动佐证了这些宝石应该是从印度、斯里兰卡等产地或满刺加、忽鲁谟斯等交易市场购入的。



图三 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的“西洋金锭”
(引自《梁庄王墓》)

四、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与历史价值

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珍贵遗产生动展示了各文明板块之间的文化交流,使我们可以通过解读港口、沉船和贸易品等考古遗迹,探究海上丝绸之路上古代族群、语言和宗教的交流史实。

海上贸易与族群之间的交流,首先需要解决语言交流的问题。泉州出土的多种语言碑刻,展示了作为国际性海港城市的族群与语言多样性。例如,泉州发现的元至治二年(1322年)“阿含抹”墓碑,用汉文与波斯文书写(阿含抹本人是一名波斯与汉人混血儿),说明当时的泉州有波斯语族群。波斯语是当时海洋贸易的国际通用语言,正因如此,郑和下西洋时曾专程前往泉州,在泉州招聘翻译,史称“通事”。《星槎胜览》和《瀛涯胜览》的作者费信与马欢,就是当年郑和在泉州招聘的两位“通事”,其传世之作成为研究郑和航海的珍贵史料。

海上贸易活动,需要有通用的货币与度量衡,以方便实现价值交换。中国铜钱,以其轻重适宜、币值稳定且携带方便成为东北亚、东南亚海上贸易的流通货币,甚至至于成为周边国家的流通货币。由于货币外流过甚,以至于宋元明清政府不得不颁布限制

铜钱出口的政令，以遏制铜钱外流造成的国内货币短缺。韩国新安沉船出水中国宋元铜钱 28 吨，总数高达 800 万枚之多，由此可见中国铜钱外流之严重，也印证了中国铜钱在东亚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与此相对应，在阿拉伯海—印度洋海域，金银币成为海洋贸易的流通货币，而这一现象，竟被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下来，《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与货币一样，海上贸易也促使不同地区在度量衡制度方面的交流，这些既有文献依据也有考古实证，比如印度的杆秤与中国的天平，学界早有讨论。有意思的是，韩国新安沉船上出水了中国宁波港商人携带的秤砣——“庆元路”铁权，堪称海上贸易在度量衡交流方面的实证。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工具——帆船，也存在着造船工艺的交流。中国帆船（以福船为代表）、阿拉伯帆船和西班牙大帆船是历史上有名的海船类型。以宋代海船为例，著名者有“泉州湾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均系福船类型的代表之作。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印旦沉船、井里汶沉船、勿里洞沉船等，虽然船货以中国瓷器为大宗，但船型均属阿拉伯帆船。菲律宾海域发现的“圣迭戈”号沉船，则是西班牙大帆船的代表。现存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的“Cutty Sark”号茶叶贸易船，则可以看作是殖民贸易时代晚期快速帆船的典型代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交流，造船工艺也出现了中西交流的现象，宁波发现的“小白礁一号”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艘清代道光年间的沉船（发现了越南和日本钱币），造船工艺方面既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水密隔舱和舱料捻缝工艺，也采用了密集肋骨、防渗层等外来造船工艺。又，据学者研究，横跨太平洋贸易的西班牙大帆船，也有不少是福建工匠在马尼拉修造的。

不但造船工艺存在中外技术交流，导航技术也有技术交流的史实。一般认为，以马六甲海峡为界，以东的南海海域，主要采用中国古代的罗盘导航技术，形成“针路”航线；以西的印度洋海域，主要采用阿拉伯的天文导航技术，即文献中的“牵星过洋”。令人称奇的是，反映郑和航海线路的“郑和航海图”，既准确绘出了的南海海域的“针路”，同时在海图的末端，即波斯湾附近，画出了北极星，正是阿拉伯“牵星过洋”的印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晚期导航所用的海图，也出现了中、西绘图技术的交融，如牛津大学包德林图书馆所藏“东西洋航海图”（十七世纪早期海图），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山水地图的影子，也可以看出

西方正投影海图的绘图方法。

海上丝绸之路反映了不同族群、语言与宗教之间的交流，突出地体现了文明交流与对话的遗产价值。泉州港的开元寺（佛教）、真武庙（道教）、天后宫（妈祖）、清净寺（图四）、摩尼寺以及印度教、景教遗迹，生动展示了国际海港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斯里兰卡加勒港出土的“郑和布施锡兰山碑”，是郑和在永乐七年（1409 年）树立的一块石碑，碑文用汉文、波斯文、泰米尔文三种文字书写，分别记述了中国皇帝向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主神供奉的辞文，堪称反映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族群、语言和宗教相互交流的代表之作。



图四 泉州清净寺遗迹
（始建于 1009 年，姜波摄）

注释：

关于这一点，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对地中海贸易圈的研究堪称经典，参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唐家龙等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2013 年。

（澳）安东尼·瑞德著，吴小安、孙来臣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商务印书馆，2010 年。

黄柏龄编：《九日山志》（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年。

沈琼华主编：《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12 年。

姜波：《“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宝石贸易：以明定陵和梁庄王墓的发现为例》，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新技术·新方法·新思路——首届“水下考古·宁波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编：《梁庄王墓》（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7 年。

顿贺、林国聪：《“小白礁一号”古船研究》，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新技术·新方法·新思路——首届“水下考古·宁波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 年。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 年。

姜波：《从泉州到锡兰山：明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交往》，《学术月刊》2013 年第 7 期。